



记忆中的小喇叭

□ 乔玉璞

20世纪70年代,家里没有闹钟,也没有其他报时工具,唤醒我起床上学的是那个挂在墙上的小喇叭每天播放的《东方红》;每晚催促我钻进被窝、进入梦乡的是那个小喇叭播放的《国际歌》。母亲参照小喇叭的播音时间安排我家的一日三餐,既不耽误我上学,也不耽误父亲下地干活。

小喇叭是当时社员的重要信息源,能听新闻、戏曲、小说和农技知识,还能听天气预报。这是当时公认的让人们“足不出屋,便知天下事”的好玩意儿。



我所在的阳谷县阿城公社赵店村,和其他村一样,安装小喇叭前,如同一座“信息孤岛”,对外界的事一无所知。村里只有一份报纸、一份杂志,要么放在大队部里束之高阁,要么挂在大队部的报栏里无人问津。一是因为村里识字的人少,二是因为即便识字,到大队部阅读也不方便。后来,小喇叭慢慢走进千家万户,很多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小喇叭里播报的一些信息,而且小喇叭传递的信息比报纸、杂志快,也多。

至于我村哪年开始安装小喇叭,我已记不清了,大概是1972年或1973年的春天。当时,大队组织劳力帮助公社广播站的人在主街道或胡同里栽电线杆,并拉一根电线,叫“火线”。这不用社员拿钱。不过,从“火线”接到每户屋里的这段线要由社员自己掏钱买,还要另外买小喇叭。但多数社员生活都不宽裕,哪有钱买电线、买小喇叭?“火线”拉到街上一两个月,还少有人理会。

我家也没钱,可父亲铁了心要安小喇叭。他念过一年多私塾,有些文字功底,当过多年生产队会计,喜欢读书看报。他常常到大队部找些旧报纸、旧杂志读,也常讲给邻居们听。若安了小喇叭也可第一时间获取报纸、杂志上的一些信息。可我家除了买小喇叭,还得买一百多米的电线,才能接到“火线”上。我家离“火线”比邻居家远,要多花不少钱,一想到这,全家人都很犯愁。

就在这时,我家母羊生了两只羊羔。父亲立马两眼放光,信心倍增:“待羊羔满月,卖了,安小喇叭、买线的钱就够了。”可等羊羔满月了,父亲却“变卦”了,他说:“羊羔没断奶,人家买走了,也不好喂。羊羔找不着母羊会叫好几天,不忍心呀。等满两个月再卖,会好些。”父亲说话坚决、在理,没人再说什么。可这也算是有盼头了。于是,我们兄妹几人都来了精神,为早日安上小喇叭,天天盼着小羊羔快快长大,能卖个好价钱。我们争着去放羊、割草,都去割最嫩、最有营养的草。我每天放学后不是割草就是放羊。母羊养得肥肥的,有充足的奶水哺乳,羊羔再吃些嫩草,长得很快,两个月的时候,羊羔浑身小卷毛,雪白雪白的,很讨人喜欢。到了说好的卖羊羔的时间,全家人又心疼起来,舍不得卖了。但是,为早日安上小喇叭,全家人也只能忍痛割爱。到了乡镇集市那一天,父亲把羊羔牵到集上,卖了个好价钱。

当天,父亲用这些钱,到公社广播站,买回一个全家人心仪已久的小喇叭,还有一卷电线。一共花了多少钱,我也不记得了,只记得父亲说,卖两只羊羔的钱所剩无几了。

我家是我们大队第一家安装小喇叭的。安小喇叭前,全家人都在西屋厨房里吃饭,安小喇叭后,我们兄妹几人都争先恐后地把碗端到悬挂着小喇叭的堂屋里吃饭,吃完一碗,小跑到厨房再盛一碗,再快步回堂屋里吃,唯恐耽误了听广播。安小喇叭的那股新鲜劲儿、兴奋劲儿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

邻居小桐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儿,小学毕业,有点儿文化,爱听说书,可很长时间听不了一回。自从我家安了小喇叭,他天天跑到我家听,有时端着饭碗来听,如果错过了第一次播出,就会等重播时再来听。

时间长了,小桐央求他爹在自己家里也安上小喇叭。他爹空闲时间给人编篓,能挣个块儿八毛的,够买酱油醋的,但在其他方面从不轻易花一分钱。小桐无论说啥他爹都不肯安,认为安这

玩意儿没用。小桐他爹除了心疼钱,更主要的是因为不识字,打心里不接受这一“新事物”。

小桐缠了好几天,他爹才勉强同意,但说出的话却如同浇了一盆凉水:“你安也行,我不出钱。”然而就这一句话,也让小桐乐了好几天。因为他想着,既然父亲“吐口”,多少得给“赞助”点儿吧。于是,他对父亲出钱仍抱有希望,想着不够的钱他自己再想办法。隔了几天,小桐看父亲仍没出钱的意思,那股高兴劲儿就消了,连续几天都皱着眉头。到哪里挣这笔钱?小桐不言不语,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。

这个时候,树上的知了叫了。“有办法了!”小桐的愁眉突然舒展开了,人也有了精气神。知了叫了,树上树下肯定有不少知了龟皮。当时,供销社把知了龟皮当作中药材收购,不过价格很便宜。虽然价格便宜,但积少成多,就有盼头。

于是,小桐每天干完农活,就拿一根长长的竹竿,在顶端绑个铁丝钩,去戳树上的知了龟皮。有一回,小桐一出大门,就仰起脖子往树上看,没想到,与他爹撞了个满怀,招来他爹的训斥:“看你着迷的样儿。”这表明他爹还是打心眼儿里不支持安小喇叭。每隔两天,小桐便将知了龟皮卖到供销社。一晃,夏天过去,立秋了,知了龟皮少了,可安小喇叭的钱还差一些,但离成功不远了。这个时候,小桐仍信心不减,再次想起了办法。

一次,小桐下地干活时,突然看到一棵老槐树上还有别人采集后遗漏的零星的黄灿灿的槐米。“有了,我再割槐米卖!”他将竹竿上绑着的铁丝钩解下来,再绑上镰刀,将那高高的槐树上的槐米割下来。

割别人剩下的槐米,小桐怕被人笑话,于是每天天不亮就出门。有一棵很高的老槐树,竹竿够不着树梢上的槐米,小桐索性爬到大枝上。他只顾仰头向上用力,没掌握好重心,从树上掉了下来,很长时间爬不起来,最后一瘸一拐地回家,幸好伤得不重,也没遇见人。到家后,他还遭到了父亲的训斥。他低头不理睬,知道父亲仍不支持他的“大业”。

小桐将割来的槐米晒了几天,卖给了供销社。如此几回,终于凑够了买小喇叭和电线的钱。终于,他家买了一个与我家一样的小喇叭,成为我们大队第二家安装小喇叭的。从此,小桐能听小说、戏曲、新闻,每天都哼着小曲走路。那种成就感、满足感是发自内心的,也着实解了他的“精神饥渴”。



我们两家安装的都是有金属架、线圈、磁铁的舌簧喇叭,声音大而清晰,开着屋门,在院子里也能听得清。

之后,又出现了一种没有金属架、线圈、磁铁的纸喇叭,如同用牛皮纸折成的一个黑黑的小浅碗。挂在墙上,风一吹,喇叭就会来回晃动。这种喇叭的声音又尖又高又细,有时还会发出异响,不能正常播放,一两分钟才能恢复正常。纸喇叭的音质比舌簧喇叭差,但价格便宜,多数社员安的是这种喇叭。

之后,家里安了小喇叭的社员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听来的信息,很有些炫耀的意味,这让那些没安小喇叭的人听了很是羡慕,后来,他们也相继安了小喇叭。至此,小喇叭在村里普及开来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收音机、收录机大量出现,小喇叭不再发声了,成了挂在墙上的摆设。如今,当年的小喇叭成了我们那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

欢迎订阅2024年度《聊城日报》《聊城晚报》

知聊城 爱聊城

订《聊城日报》,赠《聊城晚报》!更多精彩,全新呈现!

《聊城日报》全年订价:560元 全月订价:47元 零售价:2元

《聊城晚报》全年订价:160元 全月订价:20元 零售价:1元

发行服务电话:0635-2921000 18663501211

